

斯大林
列宁主义問題

第五分冊

人民出版社

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①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⁷⁴上的演說)

(速記記錄)

同志們！我不想談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說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談，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談的。布哈林談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讀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烏格兰諾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們說，怎么会这样，我們都是老布尔什維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間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錢都不值的。我們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誼团体，而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决不容許把私人友誼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

同志們，如果我們被称为老布尔什維克只是因为我們老，那我們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維克所以受到尊

^① 在这篇演說中补进了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的三十多頁原文。——編者注

敬，并不是因為他們老，而是因為他們同時又是永遠年輕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離開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頹廢和墮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歲，他也沒有權利稱為老布爾什維克，他也沒有權利要求黨尊敬他。

其次，決不能把私人友誼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常言道，友誼是友誼，公事是公事。我們都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如果私人友誼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衝突，那就應該把私人友誼放在次要地位。作為布爾什維克，我們只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也不想談到布哈林反對派某些同志的演說中所夾雜的那些對個人的暗示和隱約的責備。看來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雙關語來掩蓋我們的意見分歧的政治基礎。他們想用政客手腕來代替政治。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托姆斯基的演說。他的演說是企圖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問題的工聯主義政客的典型的演說。但是，他們這套把戲是騙不了人的。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I 一條路綫還是兩條路綫？

我們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綫還是有兩條路綫，——同志們，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李可夫在這裡發表的演說中說，總路綫我們只有一

条，如果說我們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那末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綫的了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

这样說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們的路綫是一条，只是我們在了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那末，为什么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們組織派別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在那里說中央的路綫会“招致灭亡”，說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則性的分歧，說必須彻底更換中央政治局的成員，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如果路綫是一条，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結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总路綫是一条，那末，怎么能設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綫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綫的另一部分委員呢？

难道能够設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綫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嗎？

如果路綫是一条，那末，布哈林1月30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綫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路綫是一条，那末，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2月9日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們在这个宣言中厚顏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誣蔑，責备党（一）对农

民实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二)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三)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也許这些宣言已經不复存在于世了？也許这些宣言現在已經被认为是錯誤的了？也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同意收回这些无疑是錯誤的和反党的宣言了？那就让他們公开老实地告訴我們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們的路綫是一条，只是我們在了解上存在着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中可以看出，他們不想这样做。不但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銷他們的宣言，他們声称將繼續坚持他們在这些宣言中所陈述的观点。

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綫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路綫是一条，而党的路綫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們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嗎？这真是胡說八道。

如果路綫是一条，而党的路綫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們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嗎？这真是无稽之談。

如果路綫是一条，而党的路綫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們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

策进行斗争嗎？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謬的話呢？

不是的，同志們，李可夫說我們有一條共同的路綫，這話是不大對頭的。不管怎樣，如果看看剛才所說的布哈林集團在宣言和行動方面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條共同路綫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辭職政策是從哪里來的呢？在有共同的總路綫的情況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員一貫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屢次決議，在黨內實行怠工達半年之久，難道這是可以設想的嗎？如果我們確實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綫，那末，一部分政治局委員竭力實行的這種瓦解性的辭職政策是從哪里來的呢？

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實行辭職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變黨的政策，拒絕擔任委托給他們的職務。大家知道，當時他們實行辭職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成立聯合政府，反對我們黨中央實行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政策。但是，當時的辭職政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的根據是存在着兩條不同的路綫，其中一條路綫主張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另一條路綫主張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共同成立聯合政府。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現在，布哈林反對派一方面宣稱總路綫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實行從十月革命時期的季諾維也夫和加

米涅夫那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丝毫不合邏輯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綫是一条，那末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們的路綫是两条，那末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綫是一条，那末政治局中的三人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认为在政治局通过关于五年計劃和关于农民問題的基本提綱时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綫是一条，而一部分同志在經濟政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竟放弃了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嗎？不，同志們，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綫是一条，只是我們了解上有細微的差別，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反对派的同志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2月7日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給布哈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們能够摆脱他們自己所陷入的絕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下面就是大多数中央委員在今年**2月7日**提出的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換意見中查明：

- (1) 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談判是政治錯誤；
- (2) 布哈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軍事封建剝削’

政策的論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論断，都是他在激烈辯論中冒火时說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論断，并认为他在这些問題上和中央沒有分歧；

(3) 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內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4) 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5) 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評定布哈林的錯誤的決議草案，并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演說的速記記錄等等）。

委员会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書記的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証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們的路綫确实是一条，只是我們在了解上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內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內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嗎？

有人談到党的統一，談到政治局內的集体工作。但

是，誰想達到真正的統一並重視工作的集體性，誰就應當接受這個和解方案，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為什麼拒絕這個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們的路綫是一條，那末天地間既不會有2月9日的三人團宣言，也不會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中央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不，同志們，如果看看上面所說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你們所說的有一條共同路綫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見實際上我們不是一條路綫，而是兩條路綫，其中一條是中央的路綫，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綫。

李可夫在他的演說中說我們的總路綫是一條，這是說謊。他想以此掩飾他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綫的路綫，以便暗中破壞黨的路綫。機會主義的政策正是在於抹殺意見分歧，掩蓋黨內的真實情況，掩飾自己的立場，使黨不能把問題完全弄清楚。

機會主義需要這樣的政策是為了什麼呢？為了用路綫一致的空談做掩護，而在實際上執行它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綫的路綫。李可夫在这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中就是採取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

不妨聽一聽列寧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對一般機會主義者所做的評定。這個評定對我們所以重要，不僅是

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因为它对李可夫完全适用。

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談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迴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迴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399页)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綫。有一条路綫是党的路綫,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綫。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綫,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綫,这条路綫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誣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

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組織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談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綫。这第二条路綫是机会主义的路綫。

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綫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II 階級变动和我們的意见分歧

我們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們是和什么有关的呢？

它們首先是和最近我們国内以及資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階級变动問題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們党内的意见分歧帶有偶然性。同志們，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們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階級变动和階級斗争尖銳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階級变动和階級斗争的尖銳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轉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錯誤在于他們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轉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轉变。正因为如此，他們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

布哈林反对派的領導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說中完全避开了我們国内的階級变动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斗争的尖銳化，甚至絲毫沒有暗示一下我們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階級斗争的尖

銳化有关的。同志們，这一点你們是否注意到了呢？他們无所不談，既談哲学，又談理論，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們党的方針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階級变动却一句話也沒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許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們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們国内以及資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們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沒有权利忽略的階級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們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請你們回想一下我們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請你們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們国内发生新的階級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說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評**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維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經濟工作干部和紅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顫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們因为沙赫特事件⁷⁵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經濟工作干部的問題，培养工人階級出身的紅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問題。

沙赫特事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表明了：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消滅，他們對我國經濟建設正在組織而且以後還會組織暗害活動，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一部分黨組織忽略了我們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因此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來鞏固並改善我們的組織，提高並加強我們組織的階級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不大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各個組織的工作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黨組織，就不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活動的工作向前推進。暗害活動不僅在煤礦區，而且在金屬生產方面，在軍事工業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金鉬工業等等方面，都曾經發生並且繼續在發生，這是事實。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由於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由於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着重提出了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向富農進攻、對富農和富裕分子使用強迫手段收購糧食的問題。

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什麼呢？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富農並沒有打瞌睡，富農在發展，他們在暗中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政策，而我們的黨組織、蘇維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見敵人，就是遷就敵人，不和敵人作鬥爭。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号，提出了檢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一般收購機關的口号。

再其次，由於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加強勞動紀律、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口号。這些任務要求重新審查工會和蘇維埃機關的全部實際工作，徹底活躍這些組織，並清除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因素。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對工會和蘇維埃機關里的官僚主義的口号。

最後，關於清黨口号的問題。如果以為不砥礪黨本身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就可以清除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惡習，那就可笑了。毫無疑問，官僚主義分子不僅生活在經濟組織、合作社組織、工會組織和蘇維埃組織里，而且生活在黨組織里。既然黨是所有這些組織的領導力量，那末很明顯，清黨是徹底活躍和改善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必要條件。因此就提出了清黨的口号。

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可以看出，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們是一條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不可分割的鏈條上的不可缺少**的環節。

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我國工業

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經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經济中的資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綫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須首先提高和加强經济、苏維埃、工会、党以及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設干部，必須砥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清除这些組織里的脏东西，必須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經济中的資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謂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业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經落网，但是还远沒有捕尽。資產阶级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資本有联系。資產阶级的暗害活动毫無疑問地証明：資本主义分子还远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維埃政权的发动。

至于农村的資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經繼續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維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富农在1927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1927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还比較軟弱，沒有可能認真安排自己的經济，沒有足够的資本来巩固自

己的經濟，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經過連年丰收，他們在經濟上已經安排好了，他們已經积蓄了必要的資本，于是他們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

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維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

城乡資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砸碎我們的一切組織，清除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組織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資本主义分子。

我們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資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資本主义的稳定沒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坚牢，那就更可笑了。事实上，資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着，动摇着。爭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軍备的扩充，美英之間对抗的

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

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

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准备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